

揭示北方大儒王树楠的史学思想，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与评述其史学成就，填补了王树楠史学研究方面的空白。

当代

王树楠史学研究

刘芹◎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073



王树楠史学研究

刘 芹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树楠史学研究/刘芹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1-07245-6

I. ①王... II. ①刘... III. ①王树楠(1851~1936)
—史学—思想评论 IV. ①K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41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889×1194毫米 32开本 11 875印张

字数:250千字

定价:32.00元

序

乔治忠

刘芹博士于2004年来到南开大学，攻读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入学伊始，就显示出学业上勤奋、要强，不甘人后的积极向上精神。她欲登入中国史学史的学术殿堂，毫无畏难情绪，并付出加倍的努力，读书每有所见，必与我反复讨论，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十分关键，我建议她应当选取一个现今学术界研讨相对较少的近代史家，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多次商议和斟酌，决定以《王树楠史学研究》为论题。这个选题确实很好，但研究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王树楠是个经历波折、跨越清朝与民国的历史人物，著述既包括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多有外国历史的著述，涉及面很广。刘芹在完成论文过程中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以及其中的甘苦、体验，只有她自己才能讲述。而从师生之间学业关系的角度来看，研究生在学习与探索中，勤于提问，随时主动地与导师商讨，无“藏拙”之念，乃是迅速进步和治学有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研习中国史学史多年，但重点放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学较少涉及。自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后，不得不有所改变。像刘芹这样的博士生，不是将论文初稿写完送交，而是随时、频繁地征求意见，岂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看来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教学相长”之效果尤为明显。

王树楠在清朝长期充当幕僚和地方官员，循法务实、兢兢业业，但

宦海浮沉、挫折不断。至民国时期也曾参与许多政务活动,却在记述辛亥革命的《武汉战纪》等书中表现出很深的清朝遗民情结。他的文化思想中有很深的传统观念,但也撰写《希腊春秋》、《希腊学案》、《欧洲战事本末》、《彼得兴俄记》、《欧洲族类源流略》等多种外国史著述。在这些著述内具有新旧思想杂糅的现象,而最终体现为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理解世界性的历史问题。对于王树楠这样思想比较复杂的近代史家,予以综合评价和史学史上的定位,比较难以把握。刘芹之博士论文,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描述了王树楠撰史活动的发展脉络,对其史学成就及其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关于王树楠主张大力兴商,并因此批评儒学重农抑商的思想;王树楠通过比较中外历史,得出主张“君政立国”的理念;王树楠以“保种”、“保教”、“保国”作为政治理念的主旨,因而冲淡“忠君”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等等,都是首发之论。这既是学术探讨的突破,也为史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参照。在刘芹的《王树楠史学研究》中,还有不少对史实的确切考订,如指明王树楠亲手撰著了《清史稿》的哪些篇目,理清王树楠在纂修《新疆图志》中的具体工作状况,考述了王树楠对康有为由厌恶到同情的变化等等,均为学术探讨的亮点。今刘芹博士论文经修订后即将出版面世,其中有如许研究成果支撑,《王树楠史学研究》一书足可称为成功之作。

中国近代的史学,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发展的特征,传统史学思想与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流派交织在一起,冲突、磨合,缤纷百态。具体的史家及其史学著述,也受社会背景和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常常表现为矛盾的错综与复杂。王树楠的史学成就、史学思想,即具有这种较难评价的多样性,而其他耳熟能详的近代史学大家,几乎皆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近代史家和史学现象的评论,存在颇多的不同见解,抑扬褒贬,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史学界的学者,应当从学术角度出发进行切磋,自觉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由于近

代史学与现实利益的牵涉较古代更大，提倡史学研讨完全贯彻求真、求是的准则，尤其必要。前贤论及史学评论，有“同情之了解”的说法，愚以为这个命题似有瑕疵，“同情”与否，当在“了解”之后，不可预设“同情”，当然更不该预设“排斥”。前些天，本人作了中国近代史学某一个案问题的探讨，随之颇生感触，因而填词一阕，现抄录如下，聊与刘芹博士共勉，更祈学界时贤与众多师友，能够予以“了解之同情”。

燕归梁

研习近代史学，感而笔之。

云自徘徊水自东，
看远景朦胧。
海疆忽地起西风，
新潮涌、激流冲。

八方引水，混成杂酿，
共注史坛隆。
汁新液旧乱交融，
同品味，味难同！

—— 乔治忠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识于上思斋

目 录

绪 论 王树楠研究综述	1
一、王树楠个人研究综述	4
二、王树楠文学研究综述	7
三、王树楠政绩研究综述	10
四、王树楠史学研究综述	12
第一章 王树楠生平及师友	18
第一节 王树楠生平简介	18
一、为官青神等县	19
二、张之洞幕僚	22
三、陶模幕僚、甘省为官	23
四、新疆布政使	26
五、清史馆总纂	28
六 讲学、修志	29
第二节 师友关系	30
一、晚清封疆大吏	31
二、维新变法派	35
三、桐城派	38
四、同年科举	46
五、幕僚友朋	51

六、师友关系	57
七、与外国人的交往	59
第二章 欧洲史著编纂	66
第一节 《欧洲列国战事本末》	67
一、编纂背景	67
二、编撰特点	68
三、主要内容	72
四、主要观点	79
第二节 《欧洲族类源流略》	82
一、编纂内容	82
二、编纂特点	83
第三节 《彼得兴俄记》	86
一、材料来源	87
二、重大事件认识及评价	93
第四节 《希腊春秋》和《希腊学案》	98
一、《希腊春秋》	98
二、《希腊学案》	101
第三章 当代史编纂	106
第一节 《清史稿》编纂	106
一、关外本和关内本	107
二、王树楠史稿撰修	112
三、王树楠史稿评价	128
第二节 《武汉战纪》	140
一、主要内容	140
二、政治立场	142

第四章 地方史志编纂	147
第一节 王树楠与西北《新疆图志》	147
一、《新疆图志》编纂	148
二、志稿内容分析	157
三、志稿编纂思想及特点	172
第二节 王树楠与河北地方志	181
一、《畿辅通志》	181
二、《冀县志》	181
三、《新城县志》	184
四、《河北通志稿》	185
第三节 王树楠与东北地方志	189
一、《奉天通志》	189
二、《东三省盐法新志》	192
第四节 王树楠的其他方志	195
一、《法源寺志稿》	195
二、《民国续修临邑县志》	197
第五章 人物传记编纂	201
第一节 人物传记撰写	201
一、传主身份考察	202
二、人物传记的时代性	204
三、王树楠与传主关系考察	210
四、人物传记风格	215
第二节 整理编纂乡邦先贤文献资料	219
一、编纂《畿辅丛书》	220
二、编纂《张文襄公全集》	223
三、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	227

第三节 《陶庐老人随年录》	230
第六章 王树楠史学编纂思想观念	235
第一节 史学编纂认识	235
一、撰史目的	235
二、史学认识	243
三、世界意识	250
第二节 史学编纂特点	255
一、从史志撰修看史学撰述的创新	255
二、辨镜源流,去伪存真,重视考证	257
第七章 王树楠史学观念认识	262
第一节 忧患思变易	263
一、忧患意识	263
二、变易观	265
第二节 尊君与尊中华	276
一、尊君观念	276
二、尊中华观念	278
第三节 遗民情结	285
一、遗民与遗老	285
二、王树楠的遗民心态	286
三、王树楠带有遗民情结的史学著述	290
第四节 富国与攘夷	297
一、富国	297
二、攘夷	300
结 语	311

参考文献	319
一、古籍刊印著作	319
二、现代出版著作	323
三、港台及外国人著述	330
四、论文	331
附录	338
附录一 王树楠学术年谱概略	338
附录二 王树楠笔下的爱国人物	345
附录三 与王树楠交游的遗老	353
后 记	367

绪论 王树楠研究综述

近代的中国既是一个新旧转型时期,又是一个纷杂多变的时代。在各种变量因素中,西潮的冲击又成为各种变量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晚清士人所说“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局”。在这种变局之下,中国近代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特点,因而“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做新的崇拜”。表现在近代历史学的研究中,大部分人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新派”、“进步”、“趋新”的一方,而忽视了“旧派”、“保守”一方。大家注重的是一流的精英人物,以及一些重大的问题,对其他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二三流人物则是不予理睬,造成了在研究趋新状态语境下旧派人物以及处在新旧交接、过渡时期人物的“失语”状态及其思想色谱的阙如局面。罗志田曾建议近代史研究应该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并学习古代史同行注重史料辨伪的优点,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人与事,在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上获得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历史形象。^①随着价值观念、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研究范式的改变,许多学者们把研究方向更多地锁定在向纵深、更宽广的方向拓展,注重微观形态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近年来的学术研究

①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虽然在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主题研究上有较大改观,但从史学史角度来审视考察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在由传统向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涉猎、研究、发掘还不够深入,从深度和广度对这些人物的挖掘都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近年来历史研究的途径之一是由宏观向微观研究发展,且研究日益细化,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硕果累累。清末民初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学术界的研究方向不仅仅是把眼光放在转型中的新派人物身上,更多的是把眼光转向社会转型时期的传统学者,关注他们如何应对社会的转型,以及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史学思想变化、表现形态,以及他们在转型过程中所作出成就的考察与探研。

提到史学家王树楠^①的名字,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较为陌生。但是,大家在研究晚清史、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封疆大吏张之洞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三个版本的《张文襄公全集》: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张文襄公全集》、台湾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之《张文襄公全集》、1990年中国书店海王邨古籍本《张文襄公全集》;研究新疆地区的社会状况,常常使用清末官修《新疆图志》,此时就会看到主纂者的名字:王树楠。《清史稿》是研究清史时必备的资料,翻看《清史稿》编纂人员表时,往往会看到总纂王树楠的名字。近代河北地方志及乡邦先贤史料,如《畿辅丛书》、《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征》等,王树楠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列。清末民初史家王树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思想进步,要求变法,在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在史学研究上尤其是在史料编纂整理方面可以说是成就突出,在中国近代史文献资

①王树楠(1851—1936),河北新城人,字晋卿,号陶庐老人,近代史学家、方志名家、文学家。

学界资料用法较多,如“王树相”、“王树楠”、“王树柎”、“王树枌”等,本人博士论文用作“王树相”。相、楠、柎都是楠的异体字,形声,从木,本义为楠木,是一种制作器具和建筑用的贵重木材。今统一用作“王树楠”。

料编纂整理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社会的构成是立体而又多层次的,社会上不仅仅是精英人物阶层、官僚阶层以及英雄人物的存在,还有民众阶层以及社会上的士绅阶层,他们的思想和心理发展历程更值得研究。因此,处于官与民之间,地方与国家体制之间,处于社会转型之际的人物思想色谱及心理发展历程更能反映出社会发展变化轨迹,他们是中国近代社会事件的主角和参与者、很多事件的近距离观察者,他们面对社会危机和民族危亡,同样发出了理性而又警醒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发展脉络以及心理发展历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他们留下的著述中去理解、领会、体验和感悟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思想的进步性和深邃性,而王树楠恰恰就是一个这样有代表性的人物。

王树楠是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中举之后进入中国社会体制之内,曾经在西部地区为官,因此得以接触基层社会,他实践着自己造福于民的理念,推动了中国近代西部地区开发、建设以及社会的进步;但他又是一个面对民族危机,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进步之人,以变易观为指导,积极要求实行变革并亲身实践,面对国势衰微、列强的入侵,进一步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出理性而又警醒的声音,探求拯救国家方案,并有多部史著传世。

台湾学者姚渔湘曾将王树楠定位为民国时期的史家。他在《民国历史学人表》中,以历史著述为标准,将卒于民国年间的史家列举了50多位,王树楠的名字位列其中。^①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以王树楠作为个案研究来考察史学史发展,具有典型性。他受过传统教育,一生著述较多,尤其是在史学方面,更是成果突出。在没有出国经历的情况下,靠勾稽史书资料编撰外史方式,撰有

①姚渔湘:《民国历史学人表》(中),《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5册《近代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版,第240页。

多部欧洲史,向时人介绍欧洲历史知识,启迪国人,要求变革中国社会现状,图谋自强之道;他是《清史稿》总纂之一,撰有咸同列传、食货志、地理志等部分,成为《清史稿》出力最多者之一;他主纂《新疆图志》等多部地方志,编撰过许多清末民初时期的人物传记资料。王树楠学术涉猎较为广泛,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经、史、子、集、算学等多个学术方面都有撰著问世,尤其是其史学著作中,以史为鉴,从历史中透视中国社会现实,体现出其史学为现实服务之观点。以王树楠作为人物中心,可以展示当时晚清民国社会时期,作为一个处在中央政权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如何应对社会变化,以及他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探索。对王树楠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长期以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却较少,既不系统,也不全面,难以形成整体性认识。目前,学术界对王树楠史学编纂研究状况与其史学成就相比较为薄弱,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值得挖掘的内容还很多,因此我把研究课题锁定在对清末民初王树楠及其史学编纂成就的研究考察上,以史家王树楠作为研究方向,通过对王树楠史学编纂研究来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学者的思想,考察王树楠在19世纪末严重的社会危机大背景下,出于史家的自觉意识撰写史书,介绍新学知识,启迪国人,要求变革社会,挽救民族危机,达到经世致用之目的。

一、王树楠个人研究综述

王树楠去世后,尚秉和为其撰写行状和家传,墓志铭由涂凤书撰成,墓碑由萧方骏书写,张朝墉篆盖,陈云亭刻书等人合作而成。与其生前交游甚好的一些朋友出于纪念目的,纷纷撰文为其一生作出评价,同时对其一生之学术成就与政绩进行梳理与回顾,为王树楠撰文的先后有萧菊君、王森然、叶昌炽等人,但这都是一般性的传记人物介绍,无论是详细或简单,都没有从更深一层对王树楠一生的学术成就、为官政绩及思想特点进行深入挖掘。

涂凤书,字子厚,名起敦,四川云阳人,有《厚盦诗文稿》传世。王树楠和涂凤书两人在清国史馆任职时认识,由于共同的兴趣与爱好而相互欣赏,王曾经将涂凤书五篇佳作编入自己的《故旧文存》。涂凤书在王去世后,为其撰写《新城王晋卿墓志铭》^①,以示怀念友人。

尚秉和为王树楠撰墓表《新城王公墓志铭》^②、行状《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③。尚秉和(1870—1950),河北省行唐人,晚清进士,著名易学家。1929年受聘沈阳萃升书院,1936年受聘执讲于保定莲池讲学院。尚秉和与王树楠既是河北同乡,又是同事,所以王树楠的墓志铭、行状为尚秉和所撰。他在行状中用近五千字介绍了王树楠家世、求学、为官从政、著述等状况,而尤其重在叙述王树楠在四川、甘肃、新疆为官时期的情况,把王树楠视为一名循吏,注重于他大胆实行新政,积极改革弊端,造福于民的务实政绩。

萧菊君在1936年有《王晋卿先生传略》^④,刊登在1936年《河北》月刊上。萧先生用大约九百字篇幅,简略地对王树楠本人作出评价,这篇文章是为哀悼王树楠所撰。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中有《王树楠先生评传》一章,这是当时学界中对王树楠介绍较为详细的传记性文章。王森然用两万多字篇幅,详细叙述了王树楠生平、著述、治学、交游、政绩以及学人对其评价。王森然称王树楠“幼承庭训,聪敏嗜学,博闻强记,才高识卓,又能刻苦深造,故得为世通儒。广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尤长地志学,诗赋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实近代朴学大师也”。还列举了时

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98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②汪兆镛:《碑传集三编》,《碑传集合集》(1—5),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4216—4218页。

③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章伯锋、顾亚《近代碑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4页。

④萧菊君:《王晋卿先生传略》,《河北》,1936年第4期。

人对王树楠的较高评价:如近代名士章士钊称其为“北方大儒”;黎昌庶将王闾运、王先谦、王树楠合称为“三王”等。^①

李崇元在《清代古文述传》中用约五百字篇幅,对王树楠的学术成就做了扼要介绍。王树楠承继父祖,“濡沐先业,早惠夙成,锲学不舍,考而弥笃,复为北方大师”。其为学“潜心群经诸子,实事求是,一本之故训,其考舆地及纪泰西列国事,皆精确而具史裁”。^②

王树楠去世后,谢道弘受王树楠家人委托,将王树楠著述进行整理后撰有《陶庐全书书目考》。王树楠在世时,曾刊行《陶庐丛刻》初集和二集两种,而晚年著述很多没有收入《陶庐丛刻》之中,谢道弘将王树楠原来刊印的《陶庐丛刻》改为《陶庐全书》刊行。据谢道弘统计,王树楠从1878年28岁到1935年85岁的57年时间里,共有53种685卷,一千多万字的著述。见于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记载的有43种,没有记载的10种。已经刊行40种,未刊行的有13种。刊入《陶庐丛刻》初集有20种153卷,二集10种37卷,没有刊入《陶庐丛刻》的有15种472卷。在没有刊印的著述中,当时尚有存稿者为《法源寺志》8卷、《庄子大同注》12卷两种,原稿已经遗失或者是残缺的有《畿辅方言》2卷、《中庸郑朱异同说》1卷、《尔雅郭注异同考》1卷、《建炎前议》1卷、《夏小正订经》1卷、《夏小正订传》4卷、《蛰叟》7篇、《咸同两朝列传》、《度量衡表》、《逸民传》、《叛逆传》11种。^③

杜俞曾撰写《知青神县事王晋卿德政记》,赞扬王树楠治理青神县的政绩:兴修水利,疏通、清理鸿化堰,灌溉万亩农田,获得百

①王森然:《王树楠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页。

②王云五、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卷6,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02—103页。

③谢道弘:《陶庐全书书目考》,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行。现在能够见到刊印的《陶庐丛刻》两集合本中,倒是可以看见王树楠《蛰叟》7篇,如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光绪至民国年间《陶庐丛刻》中就有《蛰叟》7篇,有可能在《丛刻》中已经刊印,谢道弘忽视了。